

A4纸大的老照片

我的外公叶舒藩(号国屏),是广东南海人,我的外婆韦慧钿是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属珠海市)。外婆藏有一张A4纸那么大的老照片,那是她十三四岁时的全家福。大家衣冠整齐,端坐在那,也有几个大人小孩站立在旁,每个人表情严肃,就像画片一样。照片后面印有“羊城十八甫黎铺映相”字样。

据查,美洲华侨黎铺是在1870年后,到广州十八甫开设黎铺照相馆的。他资金雄厚,业务量大,为全省之冠。当时,还能拍18x24英寸的团体照。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来拍大照片的都得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根据这些推断,外婆家那时家道殷富,拍成这么张照片,估计要花百元大洋。我只认得出我的外婆和曾外婆,其他长辈就只能猜测了。

那时,韦家和叶家各自都是当地闻名的大家族。曾外公韦樵菴是中医出道又研读西医,在广州有医馆;曾祖父叶叔徽(培榕)是西医世家,早已在上海开业。曾外婆刘利秋和曾祖母是亲姐妹,分别嫁给了住在两地的叶家和韦家,于是两家人有了来往。曾外公喜欢清秀实在的叶家的老大叶舒藩,想把自己的女儿老七嫁给他;不料叶舒藩硬是看上比他年长三岁的、韦家最漂亮的老三韦慧钿;于是一表人才的外公迎娶了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外婆,两家人亲上加亲。

团结互爱的家风

外公毕业于南洋公学,性格独立而自信,婚后自立门户。1917年4月13日在上海生下了我的母亲叶毓珠(艺名叶露茜)。外公先在北京任职,后来又回到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总务长和训育主任,深受老师和学生们的爱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对学校冲击很大。他于1932年10月又携家带口回上海定居。终因积劳成疾,被肝病夺去性命。刚过四十一岁生日的外婆开始守寡,那时母亲只有十七岁。她是孩子中的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比最大的弟弟还要年长九岁。外

生命的感动(上)

——纪念我的母亲叶露茜诞辰一百周年

◆ 桂未明

叶露茜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第一任丈夫赵丹失联多年并误传出牺牲的消息后,她认识了剧作家杜宣,并用演员身份为地下工作做掩护。叶露茜和杜宣的女儿桂未明近日撰文讲述母亲鲜为人知的往事。

公去世后,她责无旁贷地帮助外婆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担。

外祖父母的开明,使他们兄妹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他们身上有着一独特的人文气质,与众不同。外婆的善良、节俭和爱心,外公的诚信、严谨和独立精神影响了母亲的一生。而母亲的作为和品行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弟弟妹妹的成长。母亲和弟弟妹妹之间非常团结,遇事商量,互帮互爱,这样的家风已传承到我们这一代。

1929年秋,在哈尔滨工作的外公把十二岁的母亲送到远近闻名的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简称哈尔滨东特女一中,前身是从德私立女子学校)读初中。校长是年方三十的独身女子孔焕书。她治校严格,办学理念先进,大胆聘请各地新锐教师来任教。学校设初中部和高中部,有学生宿舍。她高度重视女生的体育发展,学校操场大,体育设施全,还有地下风雨操场。为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设立许多项目,如体育课就有划船、舞蹈操、网球等球类多种科目。我的母亲生性开朗热情,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她入校不久,除了喜欢滑雪、舞蹈外,就进了



院中悬挂的叶露茜大幅照片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卡尔登大戏

女子篮球队,还当上篮球队队长,带队参加全省女篮比赛。对少年时的她来说,不识比她高两届她六岁、喜欢画画、后来的民国才女的萧红;只知体育老师黄淑芳和打破全运会短跑纪录的田径冠军、学姐孙桂云。那时东特女一中的体育在全国名列前茅。母亲在哈尔滨的生活非常快活。

与赵丹相爱结婚

回到上海后,1933年2月,母亲进入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就读,直至毕业。校长吴醒廉,是新加坡归国华侨。那是一所全英语教学学校,课本都是英文版的,全部西化教育,专设“交际课”。学校也重视学生的艺术素质培养,鼓励学生学习戏剧、音乐、歌舞等等,师生关系也很融洽。酷爱艺术的母亲,是学校戏剧组的成员,一入学就参与“爱美戏剧”活动,还受邀去叶家花园,以艺化音乐社话剧组名义和同学李芷芬、叶青等人参加田汉编剧的《苏州夜话》等独幕剧的黄河赈灾义演。

1934年春,在叶家花园,母亲和金山、

王为一起参加左翼剧联演出的、董每戡的话剧《奇迹》,作为捐募义演。那天赵丹看完戏后,到后台向金山和王为一祝贺,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很快,他们相爱了。同年10月,母亲正式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6年4月26日,他俩持结婚证在杭州六和塔前明志结婚(另有唐纳、蓝苹和顾而已、杜小娟两对)。次年1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卡尔登(Carl Ton)大戏院,以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举行第三次公演。这是《大雷雨》首次登上中国戏剧舞台,也是母亲和赵丹第一次同台演出。赵丹饰演奇虹,母亲饰演瓦尔瓦拉,在剧中是遭无情母亲管教的兄妹俩,最后嫂子卡捷林娜(蓝苹饰)不堪受辱,投湖自尽,妹妹瓦尔瓦拉逃离家庭,奔向自由。

受母亲的无形影响,我的舅舅和阿姨们也先后走上演艺舞台,成为耀眼的童星。

这个阶段,我的四舅公韦毅也在上海。他比外婆小一岁,是叶、韦两家人中资格最老、学位最高的一个,是我党秘密党员,直到1960年才公开党员身份。

1924年1月,四舅公写道:“那时候共产党员云集广州,我有机会认识党的领导同志,如张太雷、恽代英等,我还认识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同志多人。”1928年初,四舅公带着四舅婆和儿女来到上海,由蔡元培推荐,四舅公担任了上海教育局长。1930年在地下党的举荐下,又任青年会中学校长。193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期间,除了业务工作外,他记录道:“我有时在杂志发表关于时事和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在(1935年)发表的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我常与救国会负责人,特别是邹韬奋来往。”

那时,我的母亲很爱带大舅去住在静安寺愚园路中实新邨50号的四舅公家里玩,和表妹爱莲成为好朋友(母亲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她会成为住在中实新邨44号里那个名为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实为地下党上海局书记的刘晓,和在港的我党隐蔽战线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的沪港秘密交通员)。到1941年四舅公离开上海前,两家人和孩子来往一直很密切。对母亲和我的舅舅阿姨们的学习和成长,影响很大。

玄机无界



达世新

9.陌生小伙

钟波达不禁叫停车,付钱后便往前赶去,那年轻人不时仰起脸往围墙高处看,可那围墙太高了。同样,这围墙也令钟波达感到遗憾。年轻人突然加快了脚步,钟波达几乎同时也体验到他的想法,这是想尽快走到前面,或许前面的围墙会变低,或是改用了铁丝网,这样就有可能瞥见歼-20的身影,哪怕是“只鳞片爪”也行。

天空飘起了雨丝。钟波达还在琢磨怎样才能摸清这人的底细,附近是否还有第三双眼?不经意间,两人顺着围墙拐了个弯,一条公路陡然出现在眼前。两人不约而同地再回看那围墙,其上所挂的一块黑底白字的警示牌:军事禁区,严禁翻越。

这时,雨下得大起来了。两人别无选择地都撒腿穿过公路,跑向对面餐厅的屋檐下。躲雨的地方很小,两人不由靠近了。钟波达发现挺斯文的,他搭讪道:“唉,要是没这雨,说不定我们还能看到歼-20呢!”小伙闻言愣了下:“你也是赶来看歼-20的?”“我原来就当过兵,当的还是海军航空兵!”“是吗?”年轻人不由来兴致了,“你驾驶过什么战鹰?”“我什么飞机都没开过,给战鹰站岗的!”钟波达顿了一下,又说:“你是个军迷加拍客?”他没答话。钟波达热情地说:“我们进去吧,我请你喝茶。”伸手把他拉了进去。

老板接着拿来一个菜谱,让他们点:“你们喜欢喝什么?”年轻人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带着水。”说着,他拉开牛仔包,从里面取出保温杯来。“千万别跟我客气,是我请你进来的。”钟波达一伸手把保温杯塞回他的牛仔包里。不经意间,他的手碰到了包里一个有棱有角的东西,给触痛了,低头一看,是块装在小布袋里的铝片。

“这是飞机上的铝片吧?”钟波达凭经验判断。小伙子没让他再看,把牛仔包拉上了拉链。钟波达倏地按住了他的手:“是捡来的?”机场附近有时能捡到机上掉落的东西。这铝片可

能是从歼-20上掉落下来的!而那上面的每样东西都是极为珍贵并极具保密价值的!

万豪酒店38层。品茗观景,尤子奇和凯莉的视线都投向了灯火璀璨的浦东陆家嘴,那里,东方明珠和在建的上海中心等几座超高层建筑夺人眼球。“尤先生,中国人现在造摩天大楼的欲望在全世界是最强烈的。”凯莉有感而发,“我朋友做过统计,现在上海的高层建筑是纽约的两倍之多。”尤子奇悠然点点头。“我理解我的中国同胞,他们以往被压抑得太久,一百多年来饱经列强的欺压,如今太需要向上伸展了。”说着,他伸手指向窗外做了个拍动的动作,“就像拍皮球,拍得越厉害,弹跳得就越高!”

凯莉笑了,烛火摇曳中她姣好的面容愈发光彩动人。“哦,与您进行这样富有哲理的交谈很受益,似乎应该来点酒才对。”说着,凯莉示意侍者过来,点了一瓶克兰朵桃红葡萄酒。随后说道:“不过呢,中国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拿上海这座城市来讲,你知道对面那座如今上海的最高建筑是谁设计的?”

凯莉优雅地拿起酒杯,两人举杯轻碰,尤子奇的口中立时觉出了这酒的独特,既有红浆果的,还有覆盆子、黑莓等多重味道。呀,就像面前的这位女人。

“是司马朔。别以为是中国人,他可是美国设计师Marshall Strabala的中国名字。目前世界上前十座在建和建成的超高层建筑中,这位天才的设计师就设计了其中的三座,包括828米高的迪拜哈利法塔。”凯莉的手肘靠上茶几。“中国非常缺高端设计人才。”血液里浓浓的酒精使得酒量不大的尤子奇思维不灵。

“轻松一下,我来给你弹个曲子吧。”凯莉起身走到一旁的钢琴旁弹奏起舒曼名曲。顶灯的光束在她的躯体上勾勒出美妙的曲线。

一曲终了,她回到他的面前,酒精的作用使他出言热情直率:“你太可爱了,难得结识你这样一位朋友。”“是吗?”凯莉摇摇头,“可你实际上并没有把我当成朋友啊。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重要情况告诉我呢?”“哦……那是没时间细谈啊!”尤子奇辩白道,接着便断断续续把那夜里奇闻告诉了她。

就在这时,尤子奇的手机响了,是万豪酒店的前台打来了,通知他可以去办入住手续了。

23.盖浇饭

矿石收音机的故事告一段落之后,也曾有人劝我重新组装一架新的矿石收音机,轻车熟路,那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我承认。但此时我的兴趣已不在于彼,而是与时俱进地升级到买了二极管三极管看线路图纸组装来复式晶体管收音机和超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了。

老实说,父母从牙缝里挤出钞票支持我实非易事。当时家中的经济绝不宽绰,每个月的开销常常要靠向亲朋好友求助借贷或是父亲在厂子班组里来个“互助会”方能过日脚。甚至,父亲时有将家中因季节变换穿不上的衣服被褥送往典当行或寄卖店去调头寸之事发生。

工人新村的轶事趣闻甚多,兹录几则于此。

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受我们兄妹四人欢迎的,则是大人们决定了全家下馆子去涮一顿盖浇饭,而且时间就定在了今天,此刻,马上!

这是那个年代极具特色的一个盛大的节日。不少的平民家庭都有这样的节目上演,表层原因似乎是副食品供应实在贫乏,去开一次洋荤撮一顿,深层次因素则是家里比银子更为珍贵更紧张俏的粮票遇上了周转不灵的天大问题,全家面临断粮断炊的可怖局面——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那年月的粮票是城市老百姓的命根子,填饱肚子是每天的头等大事,这一餐偶尔为之的盖浇饭,究竟是到了如何弹尽粮绝的地步,父母方才硬着头皮走了这一步棋?毕竟,这是一种无须粮票只需人民币的黑市价的高消费呵。犹记得商店里类似的供应方式,比如一块普通的糕点五分钱,不要糕点券则售五毛钱,涨价10倍没商量;一斤水果糖几毛钱,若拿不出糖果票的话,那就一粒糖五分钱,每斤要十几块钱!

我们下的馆子常年不变,走上一站路便到了:长白(新村)饭店。只记得,饭馆里冷冷清清,除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几无什么顾客,偌大的厅堂里张张桌子都空着。我们一个个饥肠辘辘地在饭桌前正襟危坐,过了不多时间,便听凭服务员一人一碗地端上了盖浇饭。说穿了,这饭也稀松平常,那浇头更是不上今

日之台面,既无现在司空见惯的什么“鱼香肉丝”“大排青菜”“蚝油牛肉”“青椒肚片”等浇头,更无任何出奇的花式花样,比如“带鱼盖浇饭”,就是三五片极其普通的带鱼之头尾,而且是小号带鱼,又如“炒素盖浇饭”,只见番茄炒洋山芋片或是花菜叶子炒油面筋。便是这等高价黑市价出售的潦潦草草的家常菜,已够得上是当年百吃不厌的山珍海味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又在追问着父母下一回吃盖浇饭的时间了。父母的回答只是直撞头皮,呵呵,真个“此时无声胜有声”。

那时的工人新村独有一景观,至今令人回味。一到月兔初升时辰,家家户户敞开了窗,每一幢楼里都有笛声嘹亮,悠扬而悠远,“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为什么会如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呢?盖源我们这些初高中毕业生赋闲在家,不读书又不分配,真不知方向在何处——只有一个去处,军队来招学有专长的文艺兵,领章帽徽一佩,

神气活现前途似锦。工人新村里有好几位吹笛子的均由此成了部队一员。消息传开,仿效者甚众,一时家家都有吹笛手。

还有更雅的,学习很“小资”的小提琴,肩上一靠,下巴一夹,斜拉琴弓,很招摇的。后来有一写诗的文友袁金康,每每上我家来,总会携一琴盒,放下打开,取出一把当时流行的小提琴,激情澎湃地演奏一曲当时流行的红歌红曲,偶尔,兴致所至,也会偷偷来上一节巴赫赫可夫斯基的洋曲洋调。他总是把声音拉得很低,而且事先让我把窗户紧紧关闭。只是,那下巴夹琴右手拉弓的潇洒姿势,那高山流水般的乐曲,令人陶醉至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犹不能忘。

由于日渐喜爱文学的缘故,当年常常和一群小青年邻居厮混一处,听他们海吹神聊沪东造船厂一个叫居有松的人——著名的工人诗人,且是全国劳模,报章杂志甚至广播里,时时听闻他的大名。在邻居们眉飞色舞的讲述中,冷作工人“小炉匠”居有松出口成章,三步成诗,五步作赋,已经成为一个神乎其神的传奇人物。

工人新村

管新生

